

## 1

## 柏拉图的生活及其背景

---

柏拉图于公元前 427 年左右生于雅典一个贵族之家，其家庭殷实富有，生活的地方约有四个世纪都是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他的双亲和祖父母辈度过了其间雅典的力量和辉煌臻于极致的半个世纪。柏拉图的家人深深卷进了他们城邦的政治生活之中。

柏拉图自己的作品充分证明了他曾受到过优越的教育。这种优越的教育除增长了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兴趣外，还使他的心灵对他所经历的整个时代的理智生活景观开放。他熟习诗歌杰作，熟习伟大戏剧家们的著作，熟习先前哲学家的作品和研究状况，熟习智者和狂文作者使用的文学分析技巧。在他的成长岁月中，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都正在写作；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两人都在他二十一岁上死去。遍及城邦的建筑和雕塑昭示了开放的民主社会雅典的富庶和繁荣。这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挫败了拥有巨大威力的波斯帝国，现在把自己看成了希腊文明最高价值的明确体现。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从整个希腊世界引来了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它为他们提供得到赞助奖励的机会，或至少提供了在一个城邦中赢得公众的机会。这个城邦因其民主制度组织而驰名，因其高度文化成就而驰名，因其对新观念的开放而驰名。希腊世界靠海联合起来；作为主要的海上力量，

雅典逐渐成了它那世界商业和知识上吸引人的地方。尽管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无一例外地来自希腊世界的东西末端，雅典海上力量的兴起，伯里克利统治下的城邦的富庶和文化生命力，为新观念预备好的市场，很快就对许多一流思想家产生了有魅力的影响，把他们吸引到了雅典。雅典变成了研习所，其间最新的观念得到透彻的谈论、探索、分析和评价：它成了新理论、新技巧和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在其间被展示和出售的市场。得到广泛普及和提高的识字水平没有消除口头文字的力量和重要性：在立法会议和法院一类地方，口头论战技巧对任何具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都至少是一种基本的辩护武器，而且可以想象得到，它会成为获得权力的关键。讲授雄辩术和争论技巧的教师有现成的听众。在许多场合，对他们提供的新技巧和新知识，听众打算而且能够付出可观的价格。

在阿提卡的温暖气候下，人们一年中多数时间的日子都是在户外度过的。在柏拉图时代，为了社会生活，为了娱乐，为了精致的演说，为了优雅的交谈，雅典人仰赖于立法会议，仰赖于法院，仰赖于剧院，仰赖于体育健身场所，仰赖于集市大会场。

在柏拉图的青年时代，智者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是其技巧得到公开展示的辩论艺术的职业代表者，是关于生活理想的本性或人类社会的基础问题的理论家。作为这样一个理论家，他为急迫挑剔的听众展示了有条不紊的雄辩技巧和他的讲演风格，展示了他的分析威力和思辨能力。

在柏拉图时代的社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哲学家的观念，无论是当代思想家或是更好地被人了解的长辈哲学家的观念，都将成为世人熟稔的讨论话题。例如，日常经验中的

东西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因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知识的对象，克拉底鲁（Cratylus）因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这一见解提出了他自己的变相说法而为人熟知。巴门尼德（Parmenides）关于实在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球体的理论得到广泛了解，就像他的学生芝诺（Zeno）的悖论广泛为人所知一样。芝诺用他的悖论为自己辩护、反对常识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s）基于数学的敌对体系。伯里克利（Pericles）给过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赞助。如柏拉图本人在《申辩篇》（*Apology*）中告知我们的，阿那克萨戈拉关于自然哲学的书能够以合理价格公开出售。它不会位于畅销书目榜首，但可以明确找到愿意尽力去把握困难见解的买主。这个困难见解是：虽则万物包含万物的部分，事物由之构成的部分在性质上却与事物本身相同。他关于万物的最终原因是“心灵”（mind）的主张抓住了他许多同时代人的想象。尽管对他们的学派信条保持宗教沉默，至少仍有某些毕达哥拉斯主张为人所知；他们在克罗顿（Croton）对权力短暂和被戏剧性终止的拥有将要求加以评说和争论。

受过教育的雅典人易于得到的某些哲学观念，是与由他那时的常识提供的那种世界图景相一致的。可是，其他哲学观念，如赫拉克利特的流变理论，巴门尼德的彻底一元论，以及芝诺使人困惑的悖论，在感觉经验材料和理智推断结论之间造成了看来必定不可弥合的断裂。

在柏拉图出生前的三个世纪中，希腊城邦着手执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计划。农业和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已然确立好了身份地位的人中的纷争：土地拥有者发现他们自己和没有土地的人处在冲突之中，那些生活在城墙内的人与生活在外面的社群关系紧张；老的贵族人士捍卫他们的传统特权，抗

衡新的由贸易造就的富豪。希腊商人的胆识进取使关于新居住地的观念得到开放，而且随着殖民地的建立，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生活标准得到提高。经济变化带来了政治不稳定。由于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四周新城邦的建立，他们需要自己的组织制度。有的曾被强加给他们或自愿采纳过与他们的建立者的城邦相同的组织制度，别的则有专门为他们安排的新组织制度。在建立长久的城邦和新殖民地中，基于传统世袭王权的相同的旧政权形式常常被新型的统治者取代。新型统治者的地位依赖于邦国中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不是依赖于亲属关系和家世血统。

殖民扩张计划是与希腊世界中识字的广泛普及相一致的。希腊字母提供了一个书写系统，这个系统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得任何理智晓事的人都能至少获得关于书写技巧的基本知识。起初，书写仅仅可以用为保存记忆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由于对书写语言的潜力的开发，新形式的文学作品很快就出现了。早期哲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即为这种作品，多少经过系统组织的观念放到了现在不只能学它们、而且也能写并研究它们的读者面前。

如其包含武装战斗和经济对抗一样，政治和社会冲突也包含观念和价值理想的斗争。柏拉图成长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一场较大范围的冲突之中，成长于城邦中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中。这就是说，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流行的政治和社会观念中，存在着明显的可塑性。对立的模式得到兜揽，相反的思想观念在喝酒圈和宴会场如同在立法会议和集会会场一样得到辩争。

柏拉图生于一个时代终结之时。在他出生之前四年，伯里克利使雅典卷入了与斯巴达（Sparta）的一场灾难性战

争。这场战争几乎持续了三十年，最终使雅典受尽羞辱。同一年，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ian）战争爆发，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雅典，并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灭绝。

伯里克利死于公元前 429 年。他的逝世使城邦失去了政治稳定和军事优势活着的象征，使其面临着斯巴达的军事和政治挑战，处于日益没有保障的领导之下。柏拉图的童年、青年和早期成年生活都是在陷入战争中的城邦度过的。他的近亲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意味着他们家族会对政治和战争的军事结局具有强烈兴趣。

柏拉图约为五岁时，雅典人劫掠了曾经叛逃斯巴达人一方的查尔克戴克（Chalkidike）中的一个城邦斯克昂内（Skione）。雅典人处死了斯克昂内的全部男性，把它的全部妇女和儿童都卖为奴隶。六年以后，弥罗斯（Melos）拒绝与雅典结盟。尽管弥罗斯打算中立，雅典人仍包围了这个城邦，掳掠了它，使它遭受了与斯克昂内一样的骇人命运。

悲剧家欧里庇德斯有勇气把他们带给弥罗斯妇女的痛苦摆到他的公民同胞眼前，这是他的不朽功劳。在其态度严厉的剧本《特洛伊妇女》中，欧里庇德斯把弥罗斯妇女描绘成了因特洛伊战争而失去丈夫和被俘获的受害者。古希腊时雅典的剧场不只是娱乐的地方。戏剧家在其中展开竞争的杰出比赛具有浓烈的宗教意味。他们创作的剧本通过具体的形象探索了关于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探索了命运的盲目力量带给人类的屈从、个人责任与城邦力量之间的冲突、战争和权力政治的受害者无望的悲惨境遇、时代仇恨的自身长存和无穷活力、人类对确定性的拼命渴求、同情的脆弱而有创造力的美。在柏拉图的晚年，他力图表明自己对摆布他们听众思

想和感情的戏剧家的自由的坚决仇视。他的反对的强度表明了他认识到的戏剧所拥有的力量。

公元前 415 年标志着对西西里的庞大军事远征的开始。军队在主将尼西阿（Nicias）的率领下出发。尼西阿对这项事业的热情必定有限。一件离奇古怪的渎神行为为他们的起程蒙上了阴影：一天晚上，雅典被崇为神物的所有赫尔墨斯（Hermes）神像都遭到了损坏。预兆是准确的：雅典人为攻取叙拉古奋斗了两年；尽管投入了好几万人员、大量船只和巨大的军事财力物力，雅典军队却遭到大失败。这造成了尼西阿本人之死，约有七千囚犯潦倒困倦于叙拉古的采石场，还有更多的人被卖身为奴。这次失败发生于柏拉图十四岁左右的时候。

公元前 411 年，民主制度被一场右翼人士发动的政变推翻。一个五百人议事会取得了权力，但仅有两年尽力维持住了它。民主制度得到恢复，战争继续进行。尽管出现过种种和平谈判的机会，至少雅典帝国的某些残迹可以从这和平谈判中得到拯救；但彻底的侵略主义的花言巧语在当时占了上风，雅典让自己投入战斗，直到吃到苦头为止。

结局是苦涩悲惨的。在公元前 404 年春天，当年柏拉图二十三岁，城邦被迫停止抵抗。对其舰队和数千士兵的俘获，在紧紧包围之中疾病和饥饿盛行的严冬，使城邦被迫屈服。市民们在恐怖中等待着。斯巴达人及其同盟则在为应如何处置他们及其城邦而争论。对斯克昂内和弥罗斯的暴行的记忆还没有消退；许多雅典人有很好的理由必定害怕得到他们自己不人道的医术开出的苦涩药方。在斯巴达的同盟者中，的确有争着要作出这样一种最终决定的强大声音。可是，最终，雅典人得到了斯巴达人的宽恕：人们得到饶恕，

但他们的长墙（Long Walls）——雅典的主要防御工事——被拆毁了，民主制度被废除了，以便为三十个统治者的掌权开路。这三十个统治者是因其反民主和拥护斯巴达的态度而被仔细挑选出来的。

无疑有许多像柏拉图那样有见地的人对民主制度的消失很少感到悲伤。他们或许正好对在从他们自己受过教育、值得尊重和富有的圈子中找出来的人领导下恢复稳定和繁荣抱有过希望。柏拉图的确希望过。“三十人”（the Thirty）中包括有他自己家的人，包括有与苏格拉底一班人经常往来的人。苏格拉底一班人用苏格拉底的分析头脑的磨石对他们的政治观念加以磨砺。由于那场失败的可悲景象，它发动了城邦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柏拉图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明智者，对政治改革怀有真正的热情。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对“民主”制度的彻底蔑视。民主制度的最高职务是由抽彩派定的。在那场战争的后期阶段，它让人忧心忡忡地显示了自己对不负责任的蛊惑人心者的劝诱声音的抵抗能力之脆弱。柏拉图很可能经历过服兵役的种种情状。他曾经参加过立法会议上的争论，对在民主制度下作出决定的实际情形有过直接了解。他也常常出入法院。既然不少政客可以在一起诉讼中功成名就或身败名裂，法律事件就成了吸引雅典大众兴趣的焦点。

由于对“三十人”的任命，柏拉图希望出现一个由能干、明智、有道德的人理性掌权的时期。这些能干、明智、有道德的人体现了他自己的贵族等级的健全生活理想和深藏心底的责任意识。柏拉图的希望迅速而彻底地幻灭了。“三十人”的统治血腥而不道德。在他的大舅父克里底亚（Critias）的领导下，“三十僭主”（the Thirty Tyrants）实

行恐怖统治：他们的反对者被消灭，潜在的反对者也被消灭了，财产被查封。使柏拉图感到强烈憎恶的是，通过将其卷进对他们的受害者之一的逮捕中，“三十人”甚至力图控告苏格拉底。

民主制度幸存的支持者逃走了，并在塞拉绪布罗和阿尼图斯( Thrasybulus and Anytus )将军的领导下组织起了一股革命势力。当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对“三十人”的支持时，公元前 403 年，他们强制登上了返回城邦的路，恢复了民主制度。这一恢复的完成带有十足离奇的局限。有一段时间，对像柏拉图这样一个年轻人而言，在得到恢复的民主制度的稳健领导下，清醒正直的法律条规和健全的政治见识看来必定可以变成现实了。然而，尽管“三十人”个个高谈美德，他们却远未能使清醒正直的法律条规和健全的政治见识变为现实。公元前 399 年，新的民主政权对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时，柏拉图感到痛苦怨恨，深深受到了伤害。他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积极卷入雅典政治的任何抱负，使自己投入了哲学研究中。

在柏拉图的青年时期，他已经跟随他的舅父查米德斯和克里底亚及哥哥阿得曼图和格老孔加入了苏格拉底一班人中。现在，他与苏格拉底圈子中的其他成员一道，退留到了麦加拉，与苏格拉底死时在场的埃利亚哲学家欧几里德在一起。

在柏拉图年轻时，苏格拉底有点像雅典公民中的名流。他是城邦公众场所的闻人；他的公民同胞常常在会场集市、健身场所看到他，或者看到他被一群年轻人和分散的老朋友及伙伴包围着在城邦散步，沉浸在交谈中。

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讲，德尔斐的神谕告诉他的朋友凯勒

丰，没有一个人比苏格拉底“更直率、更公正和更聪明”，而由于确信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神谕激发了苏格拉底去寻找某个的确比他更聪明和更有知识的人。在发现尽管他问及的那些公民同胞自信傲慢、在雅典却的确没有一个人比他的无所知更有所知之后，苏格拉底据说得出结论，既然他至少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他就的确是城邦中最聪明的人。

可是，苏格拉底似乎对他遇到的名匠留下了印象。在他的描绘中，他一再回到名匠的例子上去，以表明靠名匠为我们制鞋、罐和武器却让业余人士组成的立法会议为我们制定法律之无比荒谬。他把名匠卓著的技巧用做实用知识的典范。拥有实用知识的人能拥有道德生活。

苏格拉底的几个同人，如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和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本身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有的还成了哲学学派的创立者。这证明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教师的成功。尽管他的同人与他一道对价值问题感兴趣，他们的理论立场却有相当大的差异。

苏格拉底从来就不是一个职业教师，但他却下决心对智者发展起来的言语论战技能加以运用，把它们用于严肃的哲学目的，将智者用以证明展示他们技巧的问答游戏（*the question-and-answer game*）转变成对定义的交谈破坏检验策略（*a strategy of the conversational destruction-testing*）。

苏格拉底赢得了他许多同人的信赖和忠诚；他也受到了他的许多公民同胞的怀疑和敌视。有些人无疑受到了阿里斯托芬的剧本《云》（*The Clouds*）中对苏格拉底荒唐可笑的漫画描绘的影响。在《云》中，苏格拉底出现于他的“思想所”（*Thinkery*）中，举止古怪异常，构思着深奥的自然哲

学问题，悬吊在半空中的一个篮子里。对任何了解他的人来说，这一描绘都是荒谬可笑的，如同阿里斯托芬本来打算造成的效果仅是取笑而已那样；但对某些仅凭名字和谣传而知道他的人而言，那漫画描绘就可能会被当作实情。对那些因他蔑视民主制度而憎恨他的人而言，对那些深深怀疑他与克里底亚和阿尔基比亚德那样臭名昭著的人公开交往的人而言，他会显得是一个危险的言词编造者（word-spinner），他教导比较聪明的年轻人如何借使弱情显为强势而让一个人取胜他们的兄长。对那些用这样一种敌对的眼光来看他的人来说，民主制度恢复后不久他就受到审判，那是没有人会奇怪的。

确切地讲，柏拉图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我们不知道。苏格拉底在世期间，他创作过我们知道的任何著作，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没有理由相信他在苏格拉底死前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他有可能记下过种种想法、印象、争论和哲学观点，这些东西在他发表的对话中得到过反映，但原来本是为了供他自己使用和与朋友讨论而记下来的。事情清楚的是，保存对苏格拉底的记忆而使其免遭污蔑者的污蔑的需要，曾是影响他作出发表决定的一个因素。

柏拉图很快根据他自己的权利成了知名的哲学家。他所发表的苏格拉底对话不只是回忆录，它们也是严肃的哲学讨论作品，虽然是以一种生动有趣的文学形式出现的。

公元前 388 年，约四十岁时，柏拉图游历了意大利和西西里。他的游历因两个原因而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柏拉图结识了塔壬同的阿尔基塔（Archytas），毕达哥拉斯学派活着的重要代表；他与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一世的姻弟狄翁（Dion）形成了长久的友谊。这些关系中的第一个拓展了柏

拉图所受的强有力的理智影响，这种影响恰好提供了他为了对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下来的诸多问题作出他自己的系统答复而需要的刺激。第二个关系导致了后来在公元前 367 年和 361 年到叙拉古的两次游历。在这两次游历中，柏拉图不十分成功地力图把年轻的僭主狄奥尼修二世改变成他和狄翁觉得邦国需要的那种统治者。他从对狄奥尼修讲授几何原理开始，更无进展。

从他第一次游历叙拉古回来后不久，柏拉图建立了学园 (the Academy)。从法律上讲，学园是一个宗教社团；实际上，它是一个学者、教师和学生在一起开拓事业的学会团体，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研究。柏拉图余下的生活，除了他短暂和无益地卷入叙拉古的政治外，都花到了学园中的研究和教学上，花到了创作我们现在拥有的主要的发表著作上。

学园变成了著名学者的理智之家。它的数学和哲学成就名闻遐迩。在生物学和医学那样的别的科学领域也做了一些工作。公元前 367 年，即柏拉图第二次游历叙拉古那年，亚里士多德加入了学园。他是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而到来的，一直在那儿呆到了柏拉图死之时。

柏拉图在八十岁上逝世。他从未结过婚。他的著作证明了友谊在柏拉图的生活中的重要。他作为一个理智社团的活跃成员而耗费了他生活中的全部晚年岁月。柏拉图作为学园的创立者而受到尊重，作为苏格拉底的继承人而受到崇敬，作为一个具有举世无双的智慧、学识和美德的人而受到热爱。

## 2

## 柏拉图的作品

---

关于柏拉图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和事业，他的作品是我们所拥有的相关知识的最好和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可是，它们却是有问题的原始资料。

除了（书信）（*Letters*）和《申辩篇》外，柏拉图的作品全都以对话形式写成。有些是真正的对话，有些实际上是以插话点缀的独白。把它们解释成是对柏拉图自己观点的证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格拉底是主要的说话人，尽管在柏拉图的晚期对话中，他的重要性渐渐消失了，而且在《法律篇》（*Laws*）中被一个缺乏任何戏剧真实性的雅典陌生人取代了。了解到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敬重，把苏格拉底的确出现的对话看作是对苏格拉底的自然描述，并得出结论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所论证的东西代表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意见和论点，这是有诱惑力的。不幸的是，面对亚里士多德清楚明确的证据，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亚里士多德明确论证说，苏格拉底从未持有过柏拉图在对话中使他详尽阐述的某些信条。

把苏格拉底理解成永远在简单地扮演柏拉图的代言人角色，这同样是有问题的。在某些对话中，苏格拉底明了地展开过靠不住的论证：要接受柏拉图在写对话时把这样的论证理解为有效的，看来是有困难的。在《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被作派成忙于一部精巧而十分

荒谬的诗歌注释作品。难于相信柏拉图赞同这种样子的行为和他正在用苏格拉底展示一个范例。

假定柏拉图放入苏格拉底之口的论点和观念是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论点和观念的结论性证据，总的来说是不稳妥的；在没有进一步的支持证据的情况下，假定它们代表了柏拉图的看法，几乎也是一样不稳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联，也不是要否认从总体上讲，较之那些他放入对话中绝大多数其他说话者之口的意见和论点，柏拉图放入苏格拉底之口的意见和论点更可能体现了柏拉图的观点。可是，对话中存在着特定段落，其间明显的是，从讨论的性质、形式和内容上看，苏格拉底的某个说话者并非是柏拉图的代言人。对此，最明显的例子是由巴门尼德（Parmenides）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话中的论点展示的；清楚的是，至少在这篇对话的一个主要部分中，正是巴门尼德而不是苏格拉底体现了柏拉图的立场。

苏格拉底置身其中的越是纯正的对话，对话的结构越是靠相互对立的观点和论证之间纯正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对话，就越是对话本身，而不是作为其中个别人物的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对话的形式越是落入纯粹的惯例，对话中苏格拉底完全主导着交谈，让他的对话者仅仅只是插嘴说说临时和可有可无的平庸之词，我们在把苏格拉底当作柏拉图借以说话的假面具时，就会越发感到靠得住。

柏拉图不是苏格拉底对话的惟一作者。当被恢复的民主制度处死苏格拉底时，它引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许多他以前的同人创作了完整的对话文献，苏格拉底是其中的主要人物。糟糕透顶的是，除了残篇断简外，这一文献缺乏完整

性，仅有那些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名下的对话传给了我们。当然，还有该形式的后来例子，而且柏拉图的全部作品包括有伪造的对话，它们中的一些很早，而且虽然对说明柏拉图不是直接有用，本身却有些趣味。

苏格拉底文献包括敌视苏格拉底的著作。例如智者波吕克拉底就写过关于阿尼图斯所作的控告发言的有名版本。阿尼图斯的控告发言是为证明对苏格拉底执行死刑之正当而作的。

色诺芬写过大量苏格拉底对话录。就像柏拉图一样，他也写过一个《申辩篇》，展示苏格拉底在受审时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他写了一个《会饮篇》（*Symposium*），虽然缺少柏拉图同名对话的戏剧和哲学才华，但也不失为一篇有趣、生动和可读的作品。他有意公然写了《回忆录》（*Memorabilia*），这是一部由追忆、轶事和谈话构成的冗长集子，以辩驳针对他进行的诽谤。他是为了刻画和捍卫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称颂和例示苏格拉底的美德而写的。

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更脚踏实地，更明显地是一个道德家，有时更为生硬。可是，两种描绘之间存在着重大程度的一致：两套对话集都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对道德和生活理想问题深感兴趣的人；都展示了他为了检验对话者提出的答案的真实性而采用的条理分明的探究技巧；都展示了他由工匠的技艺所作的类推；都展示了一个其交谈闪现出幽默和机智的迷人风采的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样，有才智、好探究的朋友包围着他。这些朋友分享着他对哲学讨论的热情。两者都把他描绘成了非理性的政府形式和私下及公开生活中不道德和愚蠢举动的敌人。

尽管色诺芬时常借苏格拉底去表达他自己的兴趣（如在军事理论和家庭经济问题上），他的对话的目的却主要是传记性的：他目的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苏格拉底的生活、谈话、观念、宗教信仰和个人关系，以驳斥针对他所作的指控。柏拉图的某些对话也有几分是为了这一目的，《申辩篇》最为明确。可是，柏拉图的大多数对话，主要关注的是哲学问题；它们所具备的任何传记性兴趣都是次要的。它们意在进行研究。兴许非得要将柏拉图的对话当作苏格拉底与在其中出现的其他核心人物之间的实际交谈的记录来读，对我们的任何这种兴趣来说，色诺芬的对话都可拿来作验证之用；同样，它们也可用来确证某些事项的可靠性，这些事项是我们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看到的对苏格拉底的描绘。总之，在色诺芬的著作直接证实了柏拉图著作中的言词之处，遵循他们两人均有靠得住的理由；当两位作者的言词有冲突时，不顾另一人的材料提供的别的支持性说法而遵循两者中的任何一人，都是靠不住的。

柏拉图是一个哲学家。这常常被理解为意味着他是一个在事业生涯中坚定不移地持有一种哲学、一套固定信条的人。于是，他的著作就从它们全都展示了一种惟一的、永远不变的、紧密结合的学说的假定立场得到解读。对柏拉图著作的这样一种解读，显然过分简单化了。一旦把任何一种这样的成见放到一边，依照现代学术关于柏拉图作品的历史次序所提供的证据来解读这些对话，展示给我们的柏拉图就成了一个具有爱探索的心灵、易接受新事物的影响、随时打算重新考虑他的立场和重新构建他尝试性地确立起来的理论看法的人。他对精彩的论证情有独钟，并随时准备让他自己的看法如同反对者的看法一样接受破坏性的检验。他的作品是

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行为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们反映和体现了他的观念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他的年岁增长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他的哲学立场：对哲学是什么样子，做一个哲学家应是什么样子，这些对话都显明了柏拉图心中所发生的清楚转变。它们显示了得到运用的新方法，得到开发的新技巧。在柏拉图的哲学生活中，某些观念得到持久程度有所变化的确立和维护，这确属实情。早期对赫拉克利特的观念的熟识，使他不相信任何为依据感觉经验的知识提供根据的企图。他受到过爱利亚派哲学的影响。这派哲学力图为知识和实在寻找一种永恒的、不变的、只能用智力加以了解的根据。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让声称是真理的东西接受严格的探究和分析的需要。他仿效着苏格拉底在追求对一般术语、特别是价值术语清楚贴切的定义中展示的范例。他承续了苏格拉底对道德和政治生活理想的本性和基础问题的特殊兴趣。他也承续了对辩证方法的尊重，对为了揭示它们以之为据的假定而从内部对理论立场进行探究和分析的做法的尊重。

利用对风格体裁的客观考查，利用由我们在对话中发现的对可推定日期的事件的指涉所提供的关于年月顺序的形迹，利用对诸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篇）是柏拉图最后写成的著作这样的外部证据的掌握，对柏拉图作品的相对日期，学者们可以构想出使人信服的论说，其说服力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这些对话的相对日期，不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尽管特定的日期、尤其是（蒂迈欧篇）（*Timaeus*）的日期问题还存在）。

关于相对日期的一个令人满意的系统次序，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与解释有关的全部问题。知道某篇特定的对话在柏

拉图的整个著作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立即确定柏拉图持有在其中表达的任何具体看法，或认定其中使用的任何论据。即使我们断定柏拉图的确在为某个特定看法而争辩，也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他自此之后都持有同一看法，更不能得出结论说，因为在某篇特定的对话中没有明确提到某种观念或意见，就意味着柏拉图在写那篇对话时不持有那特定观点。

关于柏拉图全部作品中某些著作的真伪问题，仍未达成任何学术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一事实造成了特定问题。尤其是《书信》，某些学者全部否认它们，大多数学者否认它们之中的一些。可是，《第七封信》有许多辩护者。如果的确是真实的，它就是一部特别让人感兴趣的著作。它的大部分内容是柏拉图的自传。从风格体裁做出的通常论证，对我们确定这些书信是否是真实的柏拉图作品几乎没有用处；它们在形式、结构和风格上与对话是如此不同，以至风格体裁上的比较难以用于作为结论性的证据。虽然如此，既然即使该信是一部赝品，它也明显是一部早出的作品，而且如果它所描绘的整个画面不真实，便将很少有切实或表面上讲得通之处，那么，接受在《第七封信》中描绘的柏拉图生活中的事件顺序的基本、总体画面，作为构思他的传记的基础，看来就是有道理的。

关于以智者西庇阿斯（Hippias）名字命名的两篇对话的真实性，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现代学术界转而更倾向于把它们当作真实的作品加以接受，但仍有实质性的怀疑存在。

除了对话本身外，对柏拉图的哲学见解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有来自其他著作家的证据，尤其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证